

编者按：在我国，发改委系统负责对“价格垄断”行为的执法，商务部门负责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执法，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三类行为的执法，价格垄断行为除外。

发改委近期掀起的反垄断风暴可谓猛烈，下一步还可能剑指石油、电信、汽车和银行等领域。有关部门反垄断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自我国2008年施行《反垄断法》以来，五年时间中不断有因违反《反垄断法》而受到处罚的企业，联通与电信就曾因涉嫌宽带垄断而被调查，后被终止。今年年初以来，就有多起案件是因为涉嫌价格垄断被国家发改委查处，如韩国三星等6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企业价格垄断案、茅台五粮液价格垄断案、上海黄金铂金饰品价格垄断案、洋奶粉价格垄断案等。

本刊特此推出“反垄断”专题，新盼引起您的兴趣。当然，其他栏目推出的文章也值得一读。

本期专题·反垄断

- 02 中国石油业每年垄断利润4378亿
实为消费者损失
- 05 国家工商总局公布12起垄断案例
- 07 反垄断应政策强力机构独立
- 08 利益黑链致价格虚高不下
反垄断大棒朝向医疗器械
- 10 反垄断调查频现 民族企业崛起之路
- 13 高盛等12家银行被诉垄断

歌坛经纬

- 14 让一把子在镜头前流汗
武汉电视网政“攻防战”

八面来风

- 19 温州出台农民房上市新政
致使房价“怒跌”持续

历史深处

- 20 1998年王健林因何事被薄熙来骂出办公室

悦读时光

- 封三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二）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业每年垄断利润 4378 亿 实为消费者损失

只要存在制度性进入壁垒,即使其他条件与完全竞争相同,行政性垄断在一定的需求条件下同样会形成高价格、低产量以及福利损失。

“行政性垄断”,是指行政部门设立的垄断,即由某个行政部门通过行政文件(如条例、规章或意见等)的形式授予经营主体——企业或兼有营利性活动的行政机构的垄断性权力,主要表现为进入壁垒的设置和对价格的管制获得特殊的便利和优势,形成不同程度的垄断势力与地位的状况。

广义上,行政部门利用其起草立法草案的优越地位,通过较弱的立法机关设立的有利于某(些)企业的垄断权,也可称为行政性垄断。

行政性垄断的性质与原因

中国主要的行政性垄断行业,几乎都是从完全的计划体制中演化而来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的产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迫于财政收支的压力而产生与展开的,当中小国有企业的亏损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时,政府部门则有动力将这些国企通过产权改革交由市场决定存亡。

然而,经过多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已经变为征收收入,将行政性垄断权作为一种优惠政策给予国有企业,则是减轻国有企业所带来的财政负担的方法。因此,中央政府虽然还有改革国有企业的动力,却没有打破垄断的动力了。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巨大的国内市场逐

渐显现出来,反过来凸显对这些市场垄断的价值。由于不上交利润,也无需限制工资和奖励的发放,行政性垄断利益增加一分,拥有垄断权的企业就会分得将近一分;它们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就会有充分的动力去争取更大的行政性垄断权。

行政性垄断权的获得,通常是经过“院内活动”,采劝部门立法”的形式实现的。“院内活动”是指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通过游说行政部门官员而获得行政性垄断权的行为。一个原因是,行业部门官员与所属行业的企业高管可以转换身份,相互进入对方领域任职。这在多个行政性垄断行业中都有显现。

所谓“部门立法”,就是行政部门主导甚至操控的立法;广义上,“部门立法”还意味着行政部门的行为实际上有着立法或修法的作用。

行政性垄断是与我国的宪法相抵触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经历数次修正,其基本原则已有很大改变,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内容。包含设立行政性垄断权内容的法律和行政文件,已然与我国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不相一致。

另外,从程序上讲,授予某一(类)企业垄断权是重大的经济决策,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改变,根据《立法法》,应由立法机关立法设立。根据法律保留原则,不经立法机关设立的垄断权,是对潜在竞争者的经济自由权和消费者选择自由权的限制。

我国的实践中,大多数的行政性垄断的依据只是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部门的自我授权。这些利用行政性公权力设立的垄断权,具有某种程度上违反性质和违法性质。

行政性垄断行为及其后果

行政性垄断主要表现为设置进入壁垒和价格管制。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卖方的或销售的价格管制;一种是买方的或购买的价格管制,表现为对行政性垄断权的拥有者在资源和其他投入的价格上的优惠以至免费。

在行政性垄断下,企业虽可呈现华丽的账面业绩,但其真实绩效却十分糟糕。例如,由于我国银行业的进入管制和利率管制,2010年位列世界十大银行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其真实净利润分别只占名义(账面)净利润的15.1%、15.7%和19.9%,利润水分占到八成以上。更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及其所致的分配扭曲,不仅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或福利损失),而且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构成损害。

理论分析表明,只要存在制度性进入壁垒,即使其他条件与完全竞争相同,在一定的需求条件下,这种行政性垄断同样会形成高价格、低产量以及福利损失。

利用行政部门设置的进入壁垒而形成的垄断高价,将原来消费者剩余转变为企业利润的情形,就是一种不公正的收入分配扭曲。如果将相当于垄断利润部分的资源用于其他由市场决定的用途,就可以多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广义上,还可加上消费者剩余)就是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垄断利润部分(即分配扭曲部分)的机会损失,也就是社会福利损失。

买方的管制价格也是一种严重的收入分配扭曲,它将本来属于国家(即全体人民)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巨额财富转移给了国有企业,显然是不公正的。我们假定行政性垄断企业少支付的资源租金用于占用更多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和资金,这些生产要素如果用于其他由市场决定

的用途,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还可以加上消费者剩余)就是这部分分配扭曲带来的机会损失,也就是社会福利损失。

社会福利损失一的估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2003年—2010年社会净福利损失为846亿元。2003年—2010年电信行业的净福利损失上限总共为4417亿元。石油行业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为13091亿元。

社会福利损失二——垄断利润估计:电信产业平均每年的行政性垄断租金约313亿元,这同时也是消费者被转移走的福利。石油行业由于垄断高价带来的垄断利润为4378亿元。食盐业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达到177亿元/年,这也同时是消费者每年的损失。这些数量都同时是社会福利损失的数量。

社会福利损失三的估计:2001年—2010年,中石油公司共少付工业土地租金1668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用地少付租金1765亿元,少付的石油资源租金为2898亿元;三大石油企业少付的财务费用为2245亿元。这些数量都同时是社会福利损失的数量。

行政性垄断还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以铁路行业为例,在正常的情况下购买火车票还很困难,说明普通客车的供给存在着一般性的短缺。从两条东西大动脉——京藏高速和青银高速上的长长的运煤车龙就可以判断,普通铁路的货运供给也是短缺的。

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京藏高速公路上竟频频长达100公里以上、时间达10天以上的大堵车。而高铁线路上的列车数量达不到设计的正常水平,即已建成的铁路资源不能充分利用。这说明,在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的投资比例上,有着严重错位。

我们估算,当高铁的一条线路每天开出的列车对数高达129对时,高铁的一单位平均成本所创造的效用,才能与普通铁路相同;而我们知道,现在最繁忙的京沪高铁每天只开出50对—90对列车。这意味着,每建1公里高铁所减少的普通铁

路的建设,都会给社会带来净损失。根据相关数据计算,高铁与普通铁路之间资源错置的福利损失每年达533亿元。

将前述行政性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一(含铁路资源错置损失)、社会福利损失二和社会福利损失三累加起来,2010年由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至少有19104亿元。其中后两项共约16169亿元;这是没有对应产品和服务的货币量,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具体地,会带来2.44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于当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的78.74%。

行政性垄断意味着对大众利益的盘剥和对垄断国企利益的输送。例如,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存贷款利率差的均值在1%—2%之间,而我国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差多年来保持在3.06%,这主要依赖于压低存款利率1.5个百分点实现的;因较低的存款利率,按2011年的全国存款平均余额771560亿元估计,全国个人与机构的利息损失则高达11573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6%。此外,用调整准备金率手段替代调整利率手段,中央银行上调一次0.5%的存款准备金率(以2011年6月20日为例),等价的利率变动为0.375%,2011年的六次上调准备金率,每次0.5%,相当于为银行业或其主要借款人减少了15623亿元的利息支出。与此同时,作为借款人的垄断国企,也由此大幅减少了利息支出。

行政性垄断还日益左右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例如近年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调整利率,越来越成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调整的频率很高,一年最多可达十次(2007年);调整幅度高达14个百分点,以至最高达到21.5%。这显得有些“反常”。而从银行企业的角度看,调整准备金率和调整利率却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在实施紧缩政策时,采用提高准备金率的手段,会使银行免去提高利率的巨额成本。

由于公权力作为行政性垄断的构成因素,以及政府部门在行政性垄断的形成、维护和强化过程中

的推动作用,在行政性垄断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造成损害的同时,相关行政部门和权力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和破坏。

第一,若要破除行政性垄断,首先须对我国行政部门的权力予以限定。我们强调,行政部门无权设立特定垄断权,任何行政部门通过规章、条例设立的垄断权都是非法的;应规定相关行政部门回避与本部门有关的法律的“实施细则”或“条例”草案的起草,或加强对行政部门起草的特定法律的“实施细则”的审查,防止其中增加设立或扩张相关特定垄断权的条款。

此外,行政部门对市场价格的管制的权力要经立法机关同意,才能设立。获得价格管制权力的行政部门在行使此种权力时,要受到《价格法》的约束,经过公正的听证会。特别是,要区分中央银行为实行货币政策而调整的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利率,避免以实施货币政策为名,对商业银行利率实行管制。

第二,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法律中已有的反垄断资源。即使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方面还有所不足,但该法中仍然不乏约束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范性内容。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同时,还专章规定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此外,关于公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宪法资源可以用来更有效地监督和约束使用和经营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的管理层。正是因为公共资源和全民所有的资产归全国人民所有,就更应该加强对这些资源和资产的掌控,使其不致流失到使用和经营它们的管理层手中;也正是因为对公共资源和全民财产的监督在制度上和技术上都存在难度,才更应该在宪法中强调,在法律中特别设立相应制度和规则。

第三,对有关创设特定垄断权的立法或修法草

国家工商总局公布 12 起垄断案例

7月29日，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案件公布平台正式开通运行，并公布了12起垄断案例，其中9起案件系有关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而涉案领域则包括保险、旅游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

反垄断案件公布平台开通

46家酒店、15家景点、2家旅游客运汽车公司和20家旅行社……云南西双版纳旅游协会和西双版纳州旅行社社会组织有关单位签订所谓《合作协议》或《自律公约》，规定各签约单位组织接

案，应建立“立法回避制度”，即与某一特定垄断权相关的行政部门不应起草法案，至少要由立法机关委托某一（些）中立方起草；再如，对于特定产业的垄断权创设草案，立法机关应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咨询；又如，应将特定垄断权的创设作为一种单项权力的创设，即不能以“类”为单位创设垄断权，如以“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为一类。

第四，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可以也应当依照现行宪法，对于涉嫌违宪设立行政性垄断的立法进行清理、审查，对于确实违宪的，应予以撤销或宣布违宪无效。

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依据现行的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规定，分别由相应的有权机关（主要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清理、撤销现有的行政部门设立的行政性垄断的各种行政文件。

第五，破除行政性垄断还要从司法改革的角度予以考虑。

其建议包括：（1）不仅仅要允许当事人（而不限于在位的企业）直接对涉嫌行政性垄断的企业向法院起诉，而且起诉不仅仅限于请求垄断企业承担民事责任，而是可以请求法院审查垄断地位的合法性；（2）修改相关立法，使法院对行政性垄断案件享有实质的审查权和对企业垄断地位的处分权；（3）改造现行的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制，

关键在于：机构和职能要整合，权威要提高（例如，不能依赖于“向上级机关建议”），程序要正当（核心是确保公正、透明和参与，而不能内部操作）；（4）要建立对行政性垄断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六，行政层面的破除行政性垄断的改革，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鼓励各种企业，包括民营企业 and 国有企业，进入到没有现行法律规定垄断权的产业领域中。如在石油产业，就只有行政文件而没有法律限制进入。对任何阻碍企业进入的行政部门，可施行行政处罚。（2）通过行政命令，废除和禁止行政部门（及其控制的行业协会）自我授予的垄断权。（3）要求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核查企业占用的公共自然资源（包括土地、采矿权等）的数量，并按市场价格向占用资源者征收租金。（4）要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参照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合理设置国有企业工资水平上限，对超出上限者予以惩罚。（5）要求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对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的财务进行专门监督，对利润分配方案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严格执行利润的上缴，并对利润再投资部分予以监督。（6）从长远看，要推动国有企业从营利性领域退出。

（天图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文）

待的团队必须通过“州旅游信息管理系统”操作，并限定酒店、景点、旅游用车等，此外还对签约单位的人住房价、景点票价等作了约定，违反者将被罚款。

对此，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经调查认定，相关协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7月29日，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案件公布平台正式开通运行，并公布12起垄断案例。上述案例便是其中之一，其它案例还包括“江西省泰和县液化石油气经营者从事垄断协议案”、“浙江省江山市混凝土经营者从事垄断协议案”等。案件涉及建筑材料、二手车交易、保险、旅游、供气等行业。

“这次集中公布已查结的垄断案件，标志着工商总局建立起反垄断案件公布机制。”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任爱荣表示，今后凡工商总局或总局授权查办的垄断案件，都将通过反垄断案件公布平台及时公布。

部分行业协会推动垄断应警惕

2012年，国家工商总局授权湖南省常德市工商局，对湖南相关市州保险业涉嫌达成垄断协议案展开调查。

经调查，从2006年5月开始，常德市保险行业协会先后组织16家保险企业签订相关《合作协议书》，并组织成立“常德市新车保险服务中心”。根据《合作协议书》，新车中心对16家保险成员单位的保费进行了调控，对各保险公司份额进行了划分，并且要求保险企业清理撤销与各专业代理和非业代理人的原代理协议。

这意味着，在常德市，除摩托车保险外，16家保险成员公司的所有新车承保业务都必须集中在新车中心办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东指出，本案中《合作协议书》虽然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签订，但在反垄断法实施后，《合作协议书》并没有终止有关市场份额分配的内容，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分割销售市场”行为。

杨东认为，常德市保险行业协会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限制了保费竞争，也侵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

任爱荣介绍说，在平台公布的12起结案垄断案件中，有9起案件是有关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的垄断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行业协会涉及垄断协议问题比较突出。”她说。

而在“西双版纳州旅游协会、西双版纳州旅行社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从事垄断协议案”中，行业协会同样在其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法律指导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垄断行为一方面限制了正常竞争，对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司、景点形成天然保护，而其他未纳入协议的公司则失去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垄断行为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可能被迫承担商家转嫁的价格以及低标准服务等。”

反垄断法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杨东说，反垄断法实施近5年来，行业协会涉嫌垄断协议的案件时有发生，“希望通过各部门执法、公示及查处，促进行业协会更加规范，竞争理念更加合理”。

据悉，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已责令相关行业协会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反垄断立案逐年增长，重点在民生领域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起实施以来，已有近5年时间。

据介绍，江苏省工商局2009年查办的连云港混凝土垄断协议案，是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后工商机关依法立案查处的第一件反垄断案。

任爱荣介绍说，从查办案件数量看，工商部门反垄断立案呈现逐年增长态势——2009年立案1件、2010年立案2件、2011年立案7件、2012年至今立案14件，查处的案件以民生领域为重点。

（《人民日报》）

反垄断应政策强力机构独立

发改委近期掀起的反垄断风暴可谓猛烈,下一步还可能剑指石油、电信、汽车和银行等领域。有关部门反垄断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分行业、分事件进行反垄断固然能扬汤止沸,但是,更应进一步加强竞争性市场的顶层设计,为社会各个主体努力创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反垄断过程中,应政策强力、机构独立。其中,可成立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反垄断部门,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反垄断机构,以达到釜底抽薪之效。

与其他国家一样,垄断往往占据超额利润的大头。统计显示,在我国最赚钱的20个企业中,有17个处于垄断领域。垄断往往成为诞生伟大企业的“天敌”。诸如腾讯、新浪和淘宝这样的企业,都诞生在竞争最充分的互联网领域。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门槛低、管制少。被央企垄断的电信、石油和金融等领域,由于存在种种市场准入的高门槛,其他资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竞争资格。

形成这一局面,与一直以来我国对竞争性市场的顶层设计重视不够有关。长期以来,我国更重视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部门设置,对竞争部门和维护竞争的反垄断部门,则缺少关注,这二者恰恰是维护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前提和保证。如浏览各部委网站便可发现,我国产业政策多如牛毛,几乎每个月都有重磅政策出台。相关产业部委设置,也是再三调整,不停变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首部反垄断法直到2007年才诞生,其他维护竞争性市场环境的规定,则散落在其他专业性法规之中,尚未形成体系。反垄断机构设置发改委、商务部等相关经济部委之下。

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应为社会各个主体努力创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

境。有鉴于此,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竞争性市场的顶层设计。

首先,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相关立法,为形成竞争性市场环境奠定法治基础。一方面,我国反垄断法出台实施以来,反垄断法中规定的竞争者集中申报制度、市场支配地位的确定等,都有待进一步的细明明确。另一方面,从各国反垄断实践经验看,仅凭一部反垄断法尚无法构成竞争性市场环境的法治基础。仅以美国为例,联邦层面反垄断法案就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诸多修正案。美国还有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金融、电信、航空等行业制定的反垄断规则,这些对我国而言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次,在部门设置上,可成立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反垄断部门。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有时遇到的阻碍恰恰不是来自企业,而是来自地方政府经济部门。原因就在于,反垄断与政府经济部门发展经济,有时在利益上存在明显冲突。地方如此,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同样难以例外,由于分管不同行业,有关部委深度介入经济不同领域。如遇利益冲突,如何一碗水端平?因此,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反垄断部门必须超然于其他利益之上。

最后,政府在简政放权同时,要进一步拆除某些行业准入壁垒。目前,在石油、电信等领域仍存在比较高的准入门槛。民营企业在不到原油进口权、电信和宽带运营牌照等。出于国家经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可在中间环节进一步加强监管,但不应一开始就设置过高的门槛,将其他社会资本阻挡在外。因此,针对不同行业的准入门槛和壁垒,也应成为反垄断部门好好打一打的“老虎”。

(9月03日《中国证券报》王新春)

利益黑链致价格虚高不下 反垄断大棒砸向医疗器械



反垄断调查风波不断。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商务部反垄断局委托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对医疗器械产品价格以及市场份额进行调查。消息一出，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事实上，已有外资医疗器械公司成为“前车之鉴”。8月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纵向垄断案作出终审宣判，强生因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构成“垄断”，被判赔偿经销商53万元。业内人士指出，医疗器械垄断定价纠葛一直难以根除，这一案例给了业界一个处理的前例，而未来或有更多垄断巨头步强生的后尘。

传言

医疗器械行业 遭“定价调查”

根据外媒报道，中国医疗器械协会国际合作部主任徐璐透露，受商务部反垄断局委托，协会正在向3000家医疗器械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收集中外企业的定价和业务情况。

一家声称收到问卷的外国生物技术公司高管表示，调查信息包括进口医疗器械的具体价格、分流至经销商处价格以及产品质量、产品体积等诸多细节。从问卷中关于定价的提问看，调查目

的之一是要判断企业是否对销售商设定了最低售价。

有知名外资医疗器械企业高管向媒体证实，公司此前确实收到了医疗器械协会带有调查问卷的邮件，邮件没有说明具体的政策意图，其中所列的表格涉及到了单个产品的一些价格问题，由于邮件落款为医疗器械协会的个人，没有配发医疗器械协会的“红头文件”，所以公司并没有回复此邮件。不过，飞利浦、佳能、罗氏诊断、美敦力等多家企业表示尚未收到相关调查问卷。

针对价格调查的传言，商务部、发改委均予以否认。商务部新闻处人士表示，商务部反垄断局并未委托中国医疗器械协会对中外医疗器械企业进行定价调查。而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陈志江亦称，发改委也未针对医疗器械企业展开调查。

南方日报记者在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的官网上看到，该协会针对此事声明称，今年6月收到过商务部市场秩序司致各相关协会、商会的关于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的调查问卷，随后将此调查问卷发给部分会员企业征求意见，“但此项调研并非接受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委托，且该问卷主要调查内容是企业是否在进入市场时遇到地区封锁问题，并非价格垄断调查”。

现状

高端医疗器械 外资占70%

虽然价格调查的消息未被证实，但国内医疗器械市场被外资寡头瓜分早已成行业共识。

在我国医用电子产品领域，90%的心电图机市场、80%的中高档监护仪市场、90%的高档多道生理记录仪市场以及60%的睡眠仪市场均被外国品牌占据，国产产品则主要集中在按摩器具、血压测量仪器等低附加值种类上。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副会长姜峰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国内医疗器械设备市场，外

资和合资企业成为主力军。进口产品在中国已经形成销售垄断。其中，通用电气、飞利浦和西门子三家企业占据了大部分的高端市场，保守估计已经超过了70%。

2012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约1500亿元，过去十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1.3%。然而，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医疗器械部数据，仅在CT设备领域，西门子、飞利浦、东芝等五家企业占国内市场的份额就高达90%。

在国内医疗器械市场，省市一级的三级医院除了一些常规消耗性产品外，主要的医疗器械均是洋货统治的世界。有医生表示，目前在三级大医院比较常见的外资医疗器械品牌有美国通用电气、飞利浦和西门子，进口价格不菲。比如：一台高级核磁共振设备，进口价格在每台1200万—2500万元之间，一台伽马刀治疗仪进口价在1000万元左右。

广东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副会长陈武山表示，外资大型医疗设备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医院大行其道，主要是政策所限。据其介绍，如果医院购买的是国产设备，则需要自己去联系银行，而如果是外资品牌，背后往往都有几个实力雄厚的大财团支持，由他们提供贷款后，便会指定医院购买某个品牌的设备。

8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纵向垄断案作出终审宣判，强生（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构成“垄断”，被判赔偿经销商北京悦邦福和科贸有限公司53万元。

“强生案是《反垄断法》颁布以来，第一起原告胜诉的反垄断案生效判决，尽管案件标的额不大，但有关判决却被业内视为纵向垄断案件的标杆。”业内人士指出，已有医疗器械业内企业因有垄断行为输掉官司，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不过，反垄断律师郝俊波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垄断行为的处罚，增加垄断企业的违法成本。如在上述案件中，强生公司仅被判赔偿50余万元。这个数额强生肯定不会放在眼里的，难以起到有效的惩罚作用。

黑幕

利益黑链 致价格虚高不下

外资垄断的背后是高昂的价格。按照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姚志修的说法，以在上海为例，目前骨科植入物和心脏科植入物领域，跨国公司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价格也比本土企业贵50%左右。

继葛兰史克案揭开药价虚高现象的一角后，强生案引发了外界对洋品牌医疗器械垄断高价的关注。据了解，在双方2008年的经销合同中，强生约定经销商不得以低于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在发现经销商“违反规定私自低价”后，强生取消其部分医院经销权，最后还停止供货。

有专家指出，这种限制经销商转售价格行为，导致了产品价格被人推高。据业内人士透露，产品定价高，医院、科室、医务人员获得的回扣也高，推荐产品的积极性大，销量也能保证。“医院和医生对高价器械诱人利润的追捧，已是‘潜规则’。一些企业定出高价，就是为了消化背后商业贿赂的成本。”

“现在生产企业这么多，大家的产品质量也都半斤八两差距不大，人家医生凭什么要用你的器械呢？自然就得给回扣给提成。”一位销售了近10年医疗器械的医药代表张某称，“有些药给予的回扣是10%，有的器械回扣比例更高。”

而据姚志修介绍，医疗器械产品的回扣比例基本都差不多，但进口产品单价高，回扣更丰厚。假设一个进口人工关节3万元，回扣可能六七千元；而国产的1.5万元，回扣只有3000元左右。

（记者 赵兵辉 实习生 罗梓健）

反垄断调查频现 民族企业崛起之路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政府的反垄断力度在不断加强与表态明显。反垄断调查对建立更加公平、规范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我国民族企业在反垄断调查期间得到了缓冲与发展的机会。

第一部分:

反垄断调查力度加大

今年年初以来,多家企业涉嫌垄断,经反垄断调查确认后由国家发改委查处,我国的反垄断调查力度在不断加强。

现在正在把反垄断的矛头指向国家很大的由央企垄断的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电信,国家反垄断局的局长许昆林最近在央视一个节目当中发表了一个谈话,他说要把反垄断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现在国家反垄断部门将反垄断的矛头对准这些领域,确实是显示了它们推进反垄断坚定的决心,反垄断局现在挑选电信行业作为攻克央企垄断的第一站,这个方向是明确的,也是准确的。

液晶面板反垄断调查

今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2001年至2006年,韩国三星、LG,我国台湾地区的奇美、友达、中华映管和瀚宇彩晶等六家企业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在中国大陆实施价格垄断行为。

2006年12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多次收到举报,反映从2001年起,韩国三星、LG,我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等液晶面板企业,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在中国大陆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国家发改委依法对此案进行了立案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在欧美已受重创的台湾友达主动报告了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的情况。经查实,

2001年至2006年六年时间里,韩国三星、LG,我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中华映管和瀚宇彩晶等六家企业,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共召开53次“晶体会议”,会议轮流承办,基本每月召开一次,主要内容是交换液晶面板市场信息,协商液晶面板价格。在中国大陆境内销售液晶面板时,涉案企业依据晶体会议协商的价格或互相交换的有关信息,操纵市场价格,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六家企业在中国大陆境内销售涉案液晶面板数量合计514.62万片,其中三星82.65万片,LG192.70万片,奇美156.89万片,友达54.94万片,中华映管27.06万片,瀚宇彩晶0.38万片,违法所得合计2.08亿元。

2012年底,在完成搜集取证、对比分析、案件审理、实施处罚等一系列工作后,这起历时6年的涉外反垄断调查宣告收官。国家发改委依法责令涉案企业退还国内彩电企业多付价款1.72亿元,没收3675万元,罚款1.44亿元,经济制裁总金额3.53亿元。其中,三星1.01亿元,LG1.18亿元,奇美9441万元,友达2189万元,中华映管1620万元,瀚宇彩晶24万元。涉案的六家液晶面板企业将国内彩电企业多付价款1.72亿元全部退还,并提出了整改措施。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境外企业价格垄断。

酒企“最低限价令”

今年1月,茅台与五粮液相继遭到反垄断调查,两家酒企发布声明,表示将立即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情况进行整改,撤销违反《反垄断法》的营销策略,并进行彻底整改。

2012年年底,受塑化剂风波和禁酒令影响,高端白酒在旺季遭遇寒冬,面对经销商竞相低价出货的态势,茅台对旗下经销商发出最低限价令,要

求经销商不得擅自降低销售价格。

茅台对3家经销商由于低价和跨区域销售被处以暂停执行茅台酒合同计划,并扣减20%保证金,以及提出黄牌警告。五粮液紧随其后,发布营销督查处理通报,对12家降价或窜货的经销商进行通报处罚。两家酒企涉及对经销商进行价格控制的违法行为。

2月22日,贵州物价局发布公告,对贵州省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开出2.47亿元的罚单;同日,四川省发改委对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开出2.02亿元罚单。上述罚款金额总计4.49亿元,是上年度两家酒企销售额的1%。3月11日,茅台、五粮液认缴全部罚款,价格垄断案就此结案。

上海黄金协会操控金价

上海黄金零售行业长期存在价格垄断现象被人民网(603000)财经披露后,引起国家发改委与上海市发改委重视,今年5月至6月期间对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及上海数家金店进行了调查取证。

该案件涉及老凤祥(600612)、老庙、亚一金店、城隍珠宝、天宝龙凤、周大福、周生生等众多上海本地及在上海开展业务的黄金饰品企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上海市物价局对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组织部分金店垄断黄、铂金饰品立案查处。经查实,行业协会组织老凤祥、老庙等金店召开会长会议,商议制定《上海黄金饰品行业黄、铂金饰品价格自律实施细则》,约定了黄、铂金饰品零售价的测算方式、测算公式和定价浮动幅度。老凤祥、老庙、亚一金店、城隍珠宝、天宝龙凤5家金店依据《价格自律细则》规定的测算公式,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制定公司黄、铂金饰品零售价,操纵黄、铂金饰品价格,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老凤祥来说,按照《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公司如果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将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2012年年

报显示,公司净利润为6.11亿元,如果按照上述法规进行处理,老凤祥或将处以2.5亿元以上、25亿元以下的罚款。

国家发改委称,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五家金店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国家发改委8月12日宣布,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因组织部分金店垄断黄、铂金饰品价格,被处以最高50万元罚款;5家金店因垄断价格被处以以上一年度相关销售额1%的罚款,共计人民币1009.37万元。

乳粉价格垄断协议

合生元等内地奶粉品牌以及雅培、美赞臣、惠氏、多美滋等进口奶粉品牌企业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价格偏高,今年7月初,这些企业被证实遭到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调查。涉案企业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事实上达成并实施了销售乳粉的价格垄断协议,不正当地维持了乳粉的销售高价,侵犯了下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排除、限制同一乳粉品牌内的价格竞争,削弱了不同乳粉品牌间的价格竞争,破坏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据介绍,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涉案企业均承认自身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涉嫌违法,并且无法证明其控制价格的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豁免条件。

8月7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对纵向价格垄断企业开出罚单,合生元、美赞臣、多美滋、雅培、富仕兰、恒天然6家企业共被处以6.6873亿元罚单。其中,广州合生元违法行为严重,不能积极主动整改,被处以以上一年销售额6%的罚款,计1.63亿元;美赞臣不能主动配合调查但能积极整改,处以一年销售额4%的罚款,计2.04亿元;多美滋、雅培、富仕兰、恒天然均处罚以上一年销售额3%,金额分别为1.72亿元、0.77亿元、0.48亿元、0.04亿元。

8月25日,6家企业已将共计6.6873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全部上缴中央国库。发改委表示,上述6

家涉案企业均明确表示不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至此,奶粉价格垄断案顺利结案。

垄断企业与反垄断调查

另外今年作为目前在华规模最大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的葛兰素史克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向政府部门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进行贿赂,形成了我国医药行业的巨大行贿案件。此次事件促使了医疗行业也被宣布纳入反垄断调查视野。

今年上半年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加大了行政执法力度,所涵盖的领域包括电子、通信、酒类、食品、药品等,均与公众密切相关;从主体性质来看,涉及国企、民企、外资、上市公司;从企业规模来讲,对央企、地方国企、跨国公司基本覆盖,调查覆盖面广且公平。

日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长许昆林表示,要把反垄断调查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领域,如石油、电信、汽车、银行这四大领域,国家反垄断部门将反垄断矛头对准这些领域以显示其推进反垄断坚定的决心。

从国家对上述的众多企业进行的繁复的反垄断调查以及处罚力度,还有将来反垄断调查领域的扩大可以看出,我国正在不断加强反垄断调查的力度。

第二部分:

民族企业发展机会

对韩国三星等6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罚,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助于深化这些液晶面板企业与中国彩电企业的合作,有效提升中国彩电企业竞争力,促进行业发展并惠及消费者。

另外,在奶粉价格垄断案件公布后,不少奶粉企业对外宣布降价。业内人士指出,总的来说,降价之后肯定会对奶粉企业的盈利能力形成一定的压力,而且预计未来几年奶粉产品或难再涨价。不过专家分析,此次案件之后,且由于新西兰事件影响,进口品牌方面,涉及新西兰奶源或者奶粉的品牌价格或

会下降,而非新西兰的进口奶粉品牌价格会有所上涨。而对国内的奶粉品牌来说,整体销售量会有所增长,但价格总体平稳。使用非新西兰奶源的国产奶粉涨势应该很明显,使用新西兰奶源的奶粉估计不是很乐观,其他坚持使用国产奶源的企业,比如伊利仍保持平稳发展。

而且在原材料价格以及人力成本逐步上升的情况下,奶粉需要进行经营模式的变革和渠道的变革来保持盈利。结合国外奶粉经营模式的成功经验,扁平化的渠道(如电商渠道、品牌连锁婴童店以及连锁药店)、深度营销模式将会是奶粉行业营销渠道变革的主要方向。

由此反映出,反垄断调查不仅可以规范市场竞争,形成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企业进行改革,促进我国经济转型,而且可以为国内民族企业提供机会,促进其发展。

日本丰田汽车自出口美国之后就一直受到美国民众的喜爱,占据美国汽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然而2009年由于美国一家人驾驶丰田出行,汽车突然加速而造成车祸,并致人死亡,最后使得丰田公司受到了美国的反垄断调查,丰田品牌受到负面影响,市场份额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为美国本土的汽车公司如福特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事件发生后,丰田汽车公司需要面对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执法机构的一系列审查。这些机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南区检察部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洛杉矶市检查部门等。

在几个月内,丰田汽车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召回近千万辆汽车。当时,丰田汽车公司正竭力重塑丰田品牌形象,并加强丰田汽车的新车销售。但美国各级政府对于丰田汽车公司进一步的审查不可避免的给丰田汽车公司重塑品牌及加强销售计划带来负面影响。

丰田汽车公司不仅要面对公司在处理突然加速问题时是否向民众完全公布车辆安全问题信息、是否违反证券交易法中上市公司必须向投资者阐明公司所存在的潜在问题这一法规的调查,还要面对美

高盛等 12 家银行被诉垄断

高盛集团、花旗集团和其他 10 家银行被诉违反美国反垄断法的规定。

本案的其他被告还包括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和瑞银。

一家美国工会养老金在递交给联邦法院的诉状中表示，高盛集团、花旗集团和其他 10 家银行违反美国反垄断法的规定，限制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的竞争。

“CDS 市场已明显被分成两派，一派是控制和扭曲市场的人，另一边为了参与市场必须顺从这种扭曲的人。”一个克里夫兰郊区工会养老金在 5 月 3 日于芝加哥递交给美国联邦法院的诉状中表示。总部位于俄亥俄州 Parma 的 Sheet Metal Workers Local

No. 53 Cleveland District Pension Plan 表示，2008 年至 2011 年间，CDS 市场的“买方”，即该机构、自然人以及实体在向“卖方”（被告）的经纪商购买或出售 CDS 合约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该机构希望就此获得赔偿。

本案的其他被告还包括美国银行、德意志银行和瑞银等。高盛、花旗以及美国银行的发言人均拒绝置评。

国际掉期业务及衍生投资工具协会的发言人 Steve Kennedy 和 Lauren Dobbs 以及德意志银行驻纽约的发言人 Duncan King 没有回应记者寻求置评的要求。

（记者：Andrew Harris）

国各个部门可能对其的指控，如电子欺诈及诈骗在内的一系列指控。

美国对丰田汽车公司的刑事指控比其他公司更加严厉。

美国历史上对汽车公司提起联邦刑事诉讼，特别是因为安全问题对汽车公司提起联邦刑事诉讼的案件非常罕见。在此之前，最著名的对汽车公司的刑事诉讼案是印第安纳州检察官因平托轿车油箱爆炸起诉福特汽车公司一案。最后福特汽车公司被判无罪。

另外在上世纪 80 年代，通用汽车公司曾在 X-car 车型刹车问题上存在撒谎行为而遭到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指控。但那次事件中，通用汽车公司仅仅遭到民事指控，而没被起诉。

丰田汽车公司除了要面临突然加速问题方面的调查外，还要面临联邦政府对其是否违反反垄断法

案的调查。2010 年 2 月 23 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对丰田汽车公司的三家供应商日本电装公司在密歇根州的分公司、日本矢崎公司和日本东海理化电机制作所突然发起调查。同时，美国司法部宣称，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对丰田汽车公司展开调查，以探究丰田汽车公司是否存在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最终调查结果是驾驶人操作不当引起车祸致人死亡，与丰田汽车公司无关，然而在这长时间的调查中，美国本土汽车公司已经迅速抓住机会抢占了丰田汽车公司的部分份额。

当然，要想自己的企业发展，除了准确抓住机遇之外，还应该注重自己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的创新研发等，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9 月 2 日 企业家日报记者 张 璐）

让一把手在镜头前流汗

武汉电视问政“攻防战”



2013年7月2日，湖北省武汉市，引起全国关注的“电视问政”再次上演，首场问作风关注公务用车。(CFP/图)

“武汉搞电视问政是一号领导决定的，电视台是完成命题作文。”

“当年武汉市搞行业测评，一些被问政的官员也是评委，参与打分，结果广电局倒数第二。”

电视问政节目中问题的大胆暴露，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让普通市民有种主人翁的快意。

2013年8月15日下午，几位访客走进了武汉市纪委。南京市纪委纠风室主任姚瑞平和南京电视台领导等人，专程前来武汉，观摩学习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节目。

2011年，武汉电视台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的主导下，创立“电视问政”直播节目，先由电视台播放

暗访视频，然后相关官员在直播现场，接受主持人、观众、评论员和专家的质询。

三年来，在直播现场，武汉的大小官员们被曝光的各类问题和尖锐的追问弄得满头大汗，“自责、愧疚、抱歉”之类表态，频繁见诸媒体。

尖锐的电视问政，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各地都有前来学习观摩的，我接待了38批。”武汉电视台新闻频道副总监胡桂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作为地方媒体，武汉电视台何以能让这么多高级别官员就相关问题公开道歉认错呢？市委书记阮成发的强力主导和市长唐良智的支持无疑是关键原因。武汉市治庸办和武汉电视台是节目的实际

执行者，官员和观众的邀请，均由他们负责。

在一位武汉市领导看来，电视问政提高了官员应对媒体和突发情况的能力，也促进了工作。“节目一完，有的局就到了问题现场，连夜搞到四点多钟，现场解决。”他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

对于参与各方来说，这三年过得并不轻松，主导节目的武汉市纪检监察官员，曾担忧“把人都得罪光了”；而看似风光的电视台，经常为问政尺度纠结不已：“成绩说到什么份上，问题说到什么份上，很考验人。”

而一些在直播现场流汗，道歉的武汉官员，也开始反思问政的价值。一位官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问政若一直停留在让大家流汗的

层面，老百姓会不会厌倦？如何使干部作风得到根本转变？问政如何能再深入一步？

一块豆腐考住一排局长

满头大汗、哑口无言、忘词、不停道歉。

“柳莺的一块豆腐，考倒了一排局长。”8月17日，武汉电视台主持人柳莺还记得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对她的这句表扬。

故事发生在7月3日晚。在武汉电视台的演播厅里，一场电视问政直播正在进行，官员和观众分坐两旁。在电视台拍摄的短片中，暗访员探访了一家被武汉市政府公布为放心豆制品企业的公司，发现加工豆腐的车间脏乱差。公司负责人说：“办证不需要多少钱，主要是打点。”

视频停下，主持人柳莺问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吴明益：“什么叫打点？谁打点？打点谁？为什么要打点？打点的目的是什么？”

吴明益回答：我觉得这个企业不具备生产条件，或者说降低了生产条件，生产豆制品是需要有标准的……

柳莺打断了他：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用这样的回答“打点”我。吴明益：打点嘛，就是要送他好处。柳莺：那你觉得这个做法对吗？吴明益：肯定不对。随后吴短暂沉默，柳莺追问：我还想等你说下一句。吴明益只好说：从这个片子来看，不管它是作坊也好企业也好，首先我们监督缺失。柳莺又问：打点的后果是什么？吴明益：不能公正执法。

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次日报道：在这场关于食品安全的电视问政现场，武汉市副市长邵为民、秦军共9次承认“监管缺失”，武汉市工商局局长高丹彦3次承认“巡查不到位”。

这种场面在电视问政中很常见。2011年11月，武汉市首次电视直播问政，就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建筑工地沙霸、石霸猖獗等十个突出问题向官员们发问，现场官员们被问得满头大汗、哑口无言、忘词、不停道歉。此后每场问政，无不如此。

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左绍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2年他第一次参加问政，就被问得公开道歉。这是他从政以来，首次在媒体上因公道歉。

武汉市黄陂区区长吴祖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视频短片事先保密，主持人和市民的问政犀利，“为追求好看，主持人有时候会打断我们的话，有时会设个陷阱让你往下跳。”

曾担任电视问政评论员的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认为，电视问政节目中对问题的大胆暴露，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让普通市民有种主人翁的快感。

8月14日，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截至目前，武汉市已举行了19场直播电视问政，先后有6名市市委常委上台接受问政。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上直播节目的武汉市副局级以上官员达百余人次。

市委书记彻夜难眠

“你要他去办个事，他要和你推三天。”

是什么力量，把一个副省级省会城市里的官员推到直播的电视镜头前逼问得满头大汗，不断认错？武汉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黄德列认为，武汉市主要领导，是这档直播节目的“总策划”。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因不断有企业反映在武汉办事难，2011年春节后，武汉市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调研，同时委托媒体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40.5%的企业认为优惠政策难以兑现；有的部门巧立名目，自行设定各种收费项目，难管的事不管，有利可图的事抢着管。

“我连续几个晚上看调研报告，看了后几乎彻夜难眠。”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一次会议上说。

当时刚上任的武汉市市长唐良智认为，武汉“政务环境不佳”，审批项目多、程序复杂、时限长；行政事业收费名目繁多，企业负担繁重。

武汉市纪委纠风办副主任张凌云曾回忆：2011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烽火通信公司绘制了一张图，描绘该公司研发大楼审批，经过248道手续才办完所有证件，耗时518个工作日。

在武汉市主要领导力推下，一场针对官员们

庸、懒、散的“治庸问责”行动在武汉展开，“电视问政”在2011年成为“治庸问责”的最新形式。

武汉市纪委书记、治庸办主任车延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电视问政迫使一些习惯了对工作打太极的官员“马上办”。在他看来，官员们应对媒体和突发情况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就连说话也变得简练了。

曾担任电视问政评论员的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认为，问政过程是一次释放善意、宣传政策、解释施政困难的过程，运用得当的话，能增加社会对施政者的体谅，减少施政阻碍。

胡桂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武汉实施“治庸问责”和“电视问政”后，2012年，武汉市对全市1000家企业问卷调查，对230家投资总额1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电话回访，83%的企业认为项目审批流程方便快捷了，96%的受访者表示满意。

直播遭到各方阻力

“直到现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

尹晨涛是电视问政节目的主力主持。8月12日，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武汉搞电视问政是一号领导决定的，电视台是完成命题作文”。

武汉市一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11年讨论是否以直播形式进行电视问政时，市委常委们意见分歧很大，有领导担心直播难以控制、政治风险巨大，明确反对直播。

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承认当时有不同意见，“直到现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总觉得这么做有点出干部的丑。官员能力强的还行，一些工作不到位的官员上去确实很尴尬”。

在市委书记阮成发等领导的强力推动下，市委常委通过了直播电视问政的决定。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现场观众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志愿者，有布衣参事，也通过网上公开报名选定一部分人观众，确保政治安全。

当时电视台内部也有声音反对直播，但主创人员坚持直播。“直播比较简单，播了就播了。录播的话，官员觉得哪段话没答好，会让你改来改

去，反而更麻烦。”参与节目策划的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副总制片人何志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把武汉市各委办局的一把手请到演播厅的工作，也是由市治庸办来完成的。一般每年年初，武汉市确定这年要解决的十个突出问题，上电视问政节目的官员主要是相关部门的一把手，由市治庸办出面邀请。

“广电局和其他单位平级，要请环保局、卫生局局长过来，他可以不来。但这个事副书记是总策划，纪委出面统一布置，大家都来且不许请假。”何志强说。

市治庸办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官员总是找理由，希望自己不上、让副手上。市纪委监察局就此作出明确纪律要求，确保一把手亲自上电视问政。“一把手来电视问政，才能真正为工作加动力，加压力，加助力；必须要来，在这期间出差的，全部要取消。”

武汉市广播电视台副总编黄德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保证节目效果，问政直播现场播放的曝光短片，在直播前都是严格保密的。

电视台也会提前就问政的主要方面和官员做些沟通。官方资料显示，武汉市纪委、宣传部要求，每年电视问政前，电视台必须由台领导带队上门，与参加问政的副市级官员沟通。

不过，武汉市纪委官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都表示，对必须“上门沟通”的副市级官员，只会告诉他们曝光的大概方向，例如是公车私用还是食品安全，不会透露曝光短片的具体内容。

问政双方的“攻防战”

“主持人成了不要欢迎的人。”

每次电视问政结束，官员们的各种窘态和尴尬表现，就会出现在次日各大媒体上。因食品问题，武汉市食药监局局长杨泽发现场鞠了个躬。后来他私下告诉主持人柳莺：“我就鞠了个躬，中央电视台播了17遍。”

承受直播压力的不仅有现场官员。2011年电视问政结束后，武汉市广电局的官员们心情也不

太好；当年，该局的行业测评为全市倒数第二。

“当年武汉市搞行业测评，一些被问政的官员也是评委，参与打分，结果广电局倒数第二。后来我们想，是不是和问政得罪了他们有关。”上述电视台中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电视台另一名中层领导回忆：2011年电视问政前，电视台与交管局关系不错，大家可以在楼下路边停车。电视问政后，交警开始给楼下的车贴罚单；工商局也对电视台一些广告开出罚单。

主持人也面临压力。电视台一名中层透露，电视问政初期，主持人尹晨芳问得比较多、比较犀利。问政完后请官员们座谈，官员们都抱怨主持人问得太尖锐，“主持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一次电视问政结束后，主持人柳莺接到了一名官员的短信：“我本来很烦你，为难的区长，搞得我们都没有面子，但你今天表现不错。高兴和不高兴的相抵，我就不怪你了，理解万岁。”

上述电视台中层认为，说主持人或电视台为难官员们，是官员们的误解。“我们平时采访时，和那些官员私交好得很，犯得着借这个平台跟他为难吗？”

电视台开始调整思路，要求主持人少问，让群众多问。“避免让人家觉得是电视台在和他过不去”。多名电视台工作人员也认为，后来让主持人少问，是因为电视问政并不是电视台问政、主持人问政，而是群众问政。按市委书记阮成发要求，是“百姓评说、百姓参与、百姓监督”。

柳莺在主持节目前，通报了阮成发在很多场合的讲话，“我就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把这想明白了，问政才能问到点子上。我主持的每一场问政结尾的话，有的是阮书记说过的话，有的是阮书记所期待的，有的是我揣摩的阮书记的语言。”

“上门沟通”、主持人少问，仍不能让被问政的官员们满意。7月4日，电视问政现场，在电视台策划下，市民高金钟给水务局局长左绍斌送了一双雨鞋——武汉街道老被水淹，送雨鞋显然有讽

刺的意思。左绍斌事后对一位主持人回忆：“鞋一给我，我都懵了，不知道怎么说了。”

7月10日举行的问政座谈会上，分管水务局的副市长张光清说：“你看，还没开始，一双套鞋就拎上来了，思维都乱了，还搞个什么。”他建议，电视台以后不要准备“刺激道具”。

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在问政现场有点恼火。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多次他话没说完，就被主持人付存操打断。付存操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问政前电视台对官员做了分析，干小明很能干但话较多，而直播时间有限，不得不数次打断他。

参与电视问政策划的市委领导们，心里也不轻松。武汉市一名参与电视问政工作的市委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开始，我们都担心，我们搞这个事，把人都得罪光了，将来他们给我们投票，会不会受影响啊。”

“坚持适度问政原则”

问到一定程度了，不处分几个人怎么下得了地？

为更好地完成问政的“政治任务”，虽然每场问政要自掏腰包补贴80万元，武汉电视台仍在不断调整，完善问政形式。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多次表示，问政要勇于曝光并推动问题解决，不担心暴露问题，只担心暴露不够，不怕再尖锐犀利些，一定要问得官员流汗。一位市委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阮成发曾当面要求主持人把组织电视问政的一位市委常委也要问得冒汗。

武汉市委一名官员说，电视问政三年来，阮成发每场直播都看，还会与家人讨论现场问答双方的表现。每年他会到电视台给工作人员“撑腰打气”，并明确问政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工作”。而市长唐良智会在问政第二天，带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问题现场，督促问题解决并一抓到底。

尽管有市委书记撑腰，电视台仍难逃压力。黄德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要求主持人少问后，今年电视台在继续“不讨论体制、机制问题，不裁决

民事纠纷,只问行政作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话语限定”,对主持人、官员又做了新的角色限定。

负责电视问政把关的武汉市纪委,也采纳了一些官员希望减轻压力的建议。武汉市纪委纠风室副主任张凌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治庸办已考虑年底问政要有适当调整,要求坚持适度问政原则,不“穷追猛打”,增加呈现各单位工作成效的比例,由“考问”向“沟通”、“对话”转变,取消给被问政官员送“礼物”的环节,此外要求主持人引导官员和百姓的沟通。

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透露,曾有武汉电视台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电视问政还处于较浅的层次,问政频率有限,而且问政的内容、尺度也有限制,“动皮毛不动筋骨”。

一名多次参加问政的武汉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武汉权力特别大和特别小的部门都不参加问政,参加的都是权力不大不小但事情特别多的部门。“比如纪委,又出了一个贪官,你们怎么防御的?像这样的问题不会问。”此外,最该参加问政的卫生、教育部门至今没参加。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认为,电视问政办得好,

是因为人民群众的鞭子比市委书记的鞭子管用。在秦前红教授看来,电视问政是民主监督其表、威权问责其里的一种形式,依靠体制内的科层问责监督和主要领导人的意志推动,核心还是通过媒体曝光后,由上级领导对下级问责。

秦前红指出,武汉电视问政三年来暴露的诸多问题,若严格按照相关问责制度来要求,应有很多官员要遭受严厉查处,但事实上相关问题官员安然无恙。

武汉城管委主任于小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问政问到一定程度了,不处分几个人怎么下得了地?可谁都会导致攀比,“凭什么揪我不揪他?”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觉得,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应该上去,多次成为节目评论员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听说武汉书记市长要参加电视问政。“他(阮成发)每次都来鼓励大家,希望他和市长也来现场参加一次。”

(8月22日 南方周末 记者 褚朝新 实习生 罗 婷)

〔上接第20页〕一位曾经在实德俱乐部做过高管的人士透露,有一天,他到徐明办公室汇报工作,中间徐接到一个电话,这位高管听出电话那头是大连市某区的一位副区长。他听出,副区长是想通过徐明,和薄熙来及薄谷开来搭上线寻求晋升机会。而徐明满口答应。

不久,这位高管就辞职了,他预感徐明会出事,“和某些领导利益捆绑太深了”。

赵明阳:新“球迷老板”

赵明阳和王健林及徐明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个狂热的大连队球迷。他经常半夜起来看欧洲五大联赛,亦经常去现场看球,对大连队很多球员的特点都很熟悉。

为大连足球寻找新家,令大连市足协颇为头疼,他们的“底线”是不能让这座城市曾经的旗帜离开大连。最终的人主者是赵明阳,“因为他投资足球意志非常强,且搞足球的动机看上去更纯粹。”大连市足协一位领导如此评价赵明阳,“在大连足球最困难的时候,赵明阳站了出来,用他不太宽厚的臂膀,扛起了大连足球。”

赵明阳买下实德俱乐部到底要花多少钱?一位实德集团清算小组的人士透露,赵明阳以承接实德集团所欠大连银行3.3亿元债务的方式收购了实德俱乐部。

(《文汇报》 张育群)

温州出台农民房上市新政 致使房价“怒跌”持续

当农民房屋也能上市,房价将会怎样?这无疑是个有趣的话题。但话题并不限于房价如何,而是会伸展到更深处。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温州(楼盘)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日前出台,10月1日起,包括农村房屋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12类产权可上市交易。外界认为,《办法》的出台,意味着温州农民房可上市买卖,具有破冰意义。

当下的温州,房价正经历“怒跌”之困。

温州泰和房产营销机构董事长林育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一旦城里人可买农民房,将对持续低迷的温州楼市造成冲击。

如果这一局面出现,那无疑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由于一些媒体报道时以“县城内交易”为视点,温州官方马上辟谣:农房可在县城内交易是误读,仅限同村。城里人不能到农村买房。

但不论如何,从无法交易,到同村内可以交易,亦有进步。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总经理董文立说,虽然目前农民房买卖仍然只限同村交易,但县城内可抵押贷款,非城镇户口人员也可以在县城内参与农房处置,这比以前有所突破。

报道说,很多温州市民对新出台的《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充满期待,但是显然,一时半会,这种期待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放开,意味着将扛上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进步实在有限。南方都市报“周俊生专栏”文章指出:“农民房上市交易,步子还可迈得大一些。”作者认为:温州做出的这个突破使人感到说会辄止,很不满足。农民房的买卖必

须限制在农民之间,这种市场依然是不完整的。而且,对于农民来说,他自己本身在农村有房子,之所以愿意再购买别的农民房,更多是看中了住房所依附的宅基地,以便将来政府征地动迁时能够收获高额补偿。但是,某处农民房如果具备了这种潜在可能的话,原主人一般也是不会主动出让房屋。由此可见,温州的这条政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不大可能使农民房交易火起来。

此前,在其他地方,关于农民房的“上市”也有零星例子,如2008年6月,北京市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该市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有条件地允许已转让的农民自住房上市交易。

2009年5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决定,部分历史遗留违建接受处理后可发红本。

但总的来说,这些探索都存在着明显的条件限制,难以推广。而温州新政有所不同,它在政策上更为“敞开”,更有普遍性。而外界也多把温州新政与当地土地改革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这样的农民房上市,其终极意义就不再局限于对房价的影响,而是关切到农民权益的提升。

凤凰网财经“财知道”栏目专题报道《温州土改吹响中国新改革号角》有言:一方面城市商品房价格贵得离谱,而另一方面“小产权房”价格较低,很多农村的房子几乎没人要,这种扭曲的价格其实是让农村补贴了城市。一旦开放集体土地入市,实现土地的自由交易,“农民将从资产增值中受益,这相当于财富的再分配”。那么,农民的资产增值,首先就不该是个梦。(9月2日《现代快报》)

1998年王健林因何事 被薄熙来骂出办公室

核心提示：1998年赛季初，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事俱备，就差发布会了。“这时薄熙来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2012年12月3日，经大连市足协上报大连市体育局同意，大连阿尔滨足球俱乐部整体收购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一事已上报中国足协。

阿尔滨集团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民营建筑公司之一，老板是43岁的赵明阳，他还是新锐中超球队大连阿尔滨队的老板。

王健林：最早的掌门人

这支成立了近20年的球队，最早的掌门人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入主后第一场比赛，王拎着20万元现金随队征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万达队夺得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甲A冠军。

第一年投资足球，王健林本来只想花400万元。到最后严重超支，掏了600万元。这对于事业刚起步的万达集团来说“简直要了命”，彼时王健林口口声声说要退出足坛。

随后，王健林带领高管去新加坡访问一家财团，对方以高规格接待。从新加坡回来后，王健林决定咬牙继续投资足球。

然而，王健林在球队运营上的实际权力较小——时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是著名的“足球市长”。1998年赛季初，王健林想请徐根宝当主教练，万

事俱备，就差发布会了。“这时薄熙来把王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原来的主教练迟尚斌是被市里重点表彰过的人物，怎能说换就换？”被薄骂出办公室后，王健林只好宣布迟尚斌官复原职。

上有市领导强硬干预，下面还要面对足坛的“假赌黑”，在足球声浪的顶点，王健林选择退出。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

徐明：“利益推徐太深了”

如果不是一心要讨“足球市长”的欢心，徐明或许从来不会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

业界人士认为，徐明进入足球圈，与大连市有意打“足球名片”的背景有关。“徐明不懂球，也不看球。”徐的一位朋友说，“他只是把足球当成企业运转的棋子。”

接管俱乐部的最初三年，大连实德队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顶级赛事的冠军。但后来，随着大连市主要领导的调整，地方政府对足球的支持逐渐减弱，一切都变了。

“以前主场比赛经常有副书记、副市长赛前看望球队，徐明就拼命把成绩做上去。但后来领导不重视足球了，连体育局长都不去看球了，徐明对足球的热情和投入也骤然降温。”一位内部人士称。

2005年，大连实德队拿到第一个中超冠军——这是这支中国职业联赛最成功球队最后的辉煌。2006年年初，大连实德队在亚洲A3联赛中排名垫底，从此开始滑坡。

（下转第18页）